

目 录

第十五卷

(一) 文学

- 记林琴南的几件事 吴家琰(1)
- 我的诗和字 柳亚子(5)
- 柳亚子在桂林 李白凤(7)
- 同鲁迅先生来往的几点印象 金 丁(15)
- “书虫”许地山轶事 周俊松(19)
- 我的创作和生活 张恨水(22)
- 达夫在闽轶事 钱履周(37)
- 缅怀老友徐志摩和陆小曼 刘海粟(41)
- “剑三今何在?”——忆王
 统照 臧克家(46)
- 追忆朱自清 陈竹隐(51)
- 诗人于廌虞的一生 许凤才(61)
- 我和邵洵美 盛佩玉(70)
- 追忆先父傅雷 傅 敏(78)
- 往事 萧 乾(85)
- 我的前半生 姚雪垠(107)
- 回忆我的姐姐萧红 张秀珂(126)
- 走向文学之路 罗 荪(129)
- 我的创作道路 草 明(133)
- 少年时代的梦幻 陈荒煤(138)
- 南社的创立与停顿 陆丹林(148)
- 未名社的始末 李奔野(154)
-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东京的
 活动 陈子谷(159)

(二) 美术·书法

- 忆父亲吴昌硕 吴东迈(163)

- 回忆吴昌硕 刘海粟(165)
- 忆白石老人 张次溪(167)
- 我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吕宜园(184)
- 国画大师黄宾虹 王伯敏(192)
- 回忆老画家程瑶笙 郑逸梅(197)
- 岭南革新派画家陈树人和高
 剑父 黎葛民 麦汉永(202)
- 工笔花鸟画大师于非闇 胡絮青(214)
- 人创造路,路召唤人 刘海粟(217)
- 忆溥儒先生 王振中(226)
- 我所知道的溥儒 唐明哲(231)
- 好花时节不闲身——忆丰子
 恺先生 刘叶秋(235)
- 父亲张大千的
 画业 萧建初 张心瑞(238)
- 张大千敦煌行 张心智(242)
- 求美的勇士——记潘张
 玉良 石 楠(263)
- 我和《流民图》 蒋兆和(270)
- 记关良 谷 苇(279)
- 敦煌在召唤 常书鸿(291)
- 艺海无涯苦作舟 吴作人(301)
- 京华艺术生涯 李霞生(308)
- 我与油画 李瑞年(313)
- 我与木刻艺术 李 桦(320)
- 初学木刻 刘 岷(322)
- 我在重庆的木刻生活 王 琦(326)
-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 刘开渠(330)
- 我的面塑生涯 郎绍安(350)
- 记“湖社画会” 陈维麟(355)
- 谈谈清末河南几位书家 杜慕堂(359)
- 忆贺孔才先生 刘叶秋(361)

- 书法家麦华三……………麦广达(364)
 闻一多和他的篆刻……………闻立鹏(367)
 我的朋友邓散木……………王逸如(372)
 我与篆刻……………刘淑度(374)

(三)音乐·舞蹈

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——萧

- 友梅……………廖辅叔(384)
 我所认识的黄自……………廖辅叔(391)
 记作曲家刘雪庵……………廖辅叔(402)
 我学习音乐的经过……………江定仙(406)
 回忆和聂耳的一次合作

- 演出……………老志诚(413)
 我与音乐……………喻宜莹(415)
 饮誉乐坛六十年的马

- 思聪……………马思聪 杨 永(422)
 我和明月社……………黎锦晖(430)
 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领导的

- 音乐宣传活动……………林 路(461)
 武汉合唱团赴东南亚的抗日

- 救亡演出……………郭戈奇(464)
 国立音乐院的“山歌社”……………伍雅谊(466)
 溥仪的“宫内府

- 乐队”……………吕金藻 冯伯阳(470)
 我的舞蹈生涯……………戴爱莲(476)
 舞蹈艺术伴我一生……………康巴尔汗(484)

(四)戏剧·电影

- 谭门艺语……………谭元寿(494)
 孙菊仙的表演艺术及其他……………许姬传(503)
 回忆杨小楼的演出……………刘曾复(507)
 喜(富)连成科班的始末……………叶龙章(513)
 我所了解的盖叫天……………沈祖安(521)
 我与金少山……………翁偶虹(525)
 余叔岩生平回忆片断……………陈维麟(534)
 学戏和演戏……………侯喜瑞(539)
 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……………梅兰芳(555)
 梅兰芳游俄记……………梅兰芳(564)

- 忆麒派创始人周信芳……………吴石坚(577)
 怀念父亲言菊朋……………言慧珠(581)
 一代名琴杨宝忠……………白宝华(584)
 荀慧生传略……………张伟君(589)
 尚小云事略……………马少波(603)
 四十年的艺术道路……………奚啸伯(613)
 马连良与马派……………迟金声(620)
 追忆砚秋……………果素瑛(628)
 我与程砚秋……………翁偶虹(644)
 杨宝森其艺其人……………杨晓雄(651)
 我是怎样演武松与关羽的……………李万春(655)
 我的昆曲艺术生活……………韩世昌(669)
 一生爱好是昆曲……………俞振飞(692)
 回忆母亲白玉霜……………李再雯(699)
 幼年学艺记……………新风霞(706)
 从艺五十年的经历和见闻……………孙芸竹(715)
 戏曲艺术家李桂云……………王登山(729)
 情系舞台……………陈素真(743)
 严凤英小传……………王冠亚(764)
 漫长的越剧革新之路……………袁雪芬(769)
 终生的追求……………丁是娥(774)
 艺海甘苦记……………周柏春(781)
 漫谈皮影戏……………郝可轩(784)
 我的自传……………侯宝林(790)
 京津相声演员谱系……………马三立(831)
 北方评书杂记……………张枢润(837)
 在鼓王刘宝全身边的日子……………苏茂贤(847)
 我的父亲欧阳予倩……………欧阳敬如(852)
 话剧运动的先行官——

- 洪深……………马彦祥(859)
 做多头燃烧的蜡烛……………顾一烟(868)
 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……………何秀君(875)
 怀念应云卫……………阳翰笙(901)
 电影艺术家蔡楚生……………陈景明(903)
 忆司徒慧敏……………司徒濂 关辉(907)
 艺坛生活漫忆……………王人美(913)
 通向银幕的路……………谢 添(922)
 上海早期的三家影片公司……………陆若严(927)

忆联华影片公司·····	孙 瑜(930)
广州早期的电影制片业·····	刘锦涛(939)
我所知道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 中央电影摄影场·····	陈兰荪(942)
从“满映”到东影·····	张辛实(949)
三四十年代新疆的电影业·····	李 富(959)

(五) 杂技·魔术

坎坷的杂技生涯·····	史德俊(965)
魔术师周化一·····	张玉文等(973)
中国魔术纵横谈·····	曾国珍(979)

忆联华影片公司·····	孙 瑜(930)
广州早期的电影制片业·····	刘锦涛(939)
我所知道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 中央电影摄影场·····	陈兰荪(942)
从“满映”到东影·····	张辛实(949)
三四十年代新疆的电影业·····	李 富(959)

(五) 杂技·魔术

坎坷的杂技生涯·····	史德俊(965)
魔术师周化一·····	张玉文等(973)
中国魔术纵横谈·····	曾国珍(979)

(一) 文 学

记林琴南的几件事

吴家琮

林琴南，福州人，1852年生。30岁中举人，时名群玉，福州致用书院、正谊书院所刻他的课艺，即用此名。字琴南，后改名纾，又号畏庐。尚有笔名冷红生、朴柳翁、春觉斋主人、望瀛楼主人、烟云楼主人、践卓翁、蠹叟等。

林于20岁左右，便在福州以教读为生，嗣后主讲福州苍霞精舍、杭州东文精舍，北京金台书院、五城学堂、顺天中学堂、北京高等实业学堂、北京大学堂、闽学堂、箴言女学堂、正志学校、励志学校、孔教大学校等，最后（约在民国七八年）在京开文学讲习会，先后将近50年，据其自述，他的学生有千余人之多。梁鸿志、黄浚都是他任教北京大学时的学生（梁、黄同于宣统元年肄业北京大学）。但梁鸿志、黄浚早已背师，梁号无畏，黄号非庐，分割林之名字为二，表明与林脱离师生的关系，兼示鄙夷之意。林首译《茶花女》小说，风行全国，名噪一时，梁鸿志思有以挫之，恃其通晓法文，重行移译，大言不惭，夸称远胜林译，林笑置不较。

林翻译欧美日本小说，凡150余种。他不谙外文，是由王寿昌、曾宗巩、魏瀚、严培南、严璩、李世中、王庆通、王庆骥、力树谿、林凯、林驹、廖珣琨、陈器、叶于沅（以上均福州人）、魏易、陈家麟、毛文钟、胡朝梁等人口述，而转译成书的。以上各人并都通晓国文，尤其是王寿昌、曾宗巩、魏瀚、胡朝梁之辈造诣较深。林译成书后，都经他们寓目，一句未安，多反复斟酌修改，所以很少有扞格不达的毛病。当时胡适赞为：古文的应用，自司马迁以来，未有林纾这样大的成绩。

1902年，陈璧为顺天府尹的第二年，奏请设立五城中学堂，以工部主事沈瑜庆为监督，刑部主事卓孝复、户部主事李毓芬为提调（均福州人），并设汉文、西文总教习两席。该学堂为北京首创的中学，朝野瞩目，所以对总教习的人选，相当慎重。陈璧保举琴南为西文总教习（西文总教习为王劭廉，天津人，留英学生），其保举林的奏折云：福建省举人候选教谕林纾，学优品粹，守正不阿，于中外政治学术，皆能贯彻，在福州主讲苍霞精舍，在杭州主讲东文精舍多年，力辟邪说，感化尤多等语。林与五城学堂相终始，连续任总教习，计15年之久。

清季，福建人在北京身居尚书、侍郎、御史、翰林等职者不下20余人，为了便利他们子弟就学，于1907年公议援照四川人创办蜀学堂成例，设立闽学堂，择宣武门福建会馆为校舍，首任监督为江春霖（字杏村，莆田人，御史）。琴南兼任国文教习，每星期授课四小时，讲课时操福州方言，朗诵古文，手舞足蹈，声震屋瓦。有一次讲授韩愈《祭十二郎》文，他以凄楚哀抑的声调，朗读头一句“呜呼，余少孤”五个字，其声呜咽，似闻啜泣。学生中有身世

之感者，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此事轰动全校师生工友。讲解这五字，费了一小时还没有收束，连上四堂才讲完这一篇。他讲解古文，极注重音调，每一篇中句读长短伸缩，抑扬顿挫，无不反复朗读，常令学生依他的音调，朗读多遍。并说好文章如朗诵得法，间以丝竹，其合拍悦耳的程度，与名伶所唱的好戏，并无二致。还说，只有操福州音，才能读得淋漓痛快，丝丝入扣。我叔父诒诚，时为闽学堂监学，为我言之如此。

林琴南曾作闽中乐府30首，对腐败陋习，有所针砭，尤其是《水无情》（痛溺女）、《生鬻腰》（伤鸦片之害）、《小脚妇》（喻缠足之弊）、《兴女学》（赞新举）等篇，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影响。该乐府发行不久，便不胫而走，风行东南各省。后一年戊戌，旅居新加坡的侨胞邱炜萼见而爱之，特出资翻印千余册流传南洋一带。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之后，林应招赴京任教，目睹京华残破荒凉，疮痍遍地，心中萦纡郁闷，可以概见。更加权奸巨蠹，暴戾恣肆，卖官鬻爵，有加无已，因而，也知朝局非改弦更张不可。所以武汉义旗一举，他浮露了一点乐观情绪，打算换上洋装，作共和国老民，对新政也表了一点姿态。时林任北京大学教习、五城学堂总教习，前一年还任旅京闽学堂教习。我父亲名畚芬，前一年也任过五城学堂、闽学堂教习，与林很相得。辛亥革命时，我父亲由北京回福州，将福州光复后的情况写信告他，以下即是林给我父亲的三封复信。

一、“（上略）共和之局已成铁案，万无更翻之理，而慕、涛（载慕、载涛）二邸图死灰之燃，合蒙古诸王咆勃于御前，以震慑孤儿寡妇，滋可悲也！项城（指袁世凯）似有成算，重兵在握，已与孙中山密电往来，大抵亲贵群诺，共和立成，亲贵反对，共和亦成，不过在此数日中耳。仆生平弗仕，不算为满洲遗民，将来仍自食其力，扶杖为共和国老民足矣！然德宗果不为武后所害，立宪早成，天下亦不糜烂至此。罪大恶极者为那拉氏，次则奕劻，又次则载泽，又次则载灃三兄弟及溥伦，万不可加以赦令也。弟早晚亦赴上海，以卖文卖画为生，度此余年，余则教吾数子，为共和国守法之国民足矣！”

二、“（上略）阳历已更，闽中已过花朝时候，妇女如春游，西国原亦有之，不足怪也，惟旗界如此萧条，想亦天道好还耳。当多尔衮、鳌拜当国之时，旗族杀我汉人，指不胜屈，书生畏祸，不敢有私家纪载，所以凶残之状，但得诸故老传闻，今日得此现状，只得归诸天道循环，微微太息而已！仆所望吾乡同胞，第一节以和衷不闹党派为上着。弊政已除，新政伊始，能兴实业则财源不涸，能振军旅则外侮不生，能广教育则人材辈出。此三事为纾日夜祷天，所求其必遂者也！淫祠尽除，此举尤妙，南台（按：指福州南台地方）五瘟之祀，尚宜一一铲除，方免愚民迷信。此间自逊位诏下，一带报馆各张白帜，大书革命成功万岁，见者欢呼，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矣。项城用张镇芳为北洋大臣，绅民哗然逐之，项城不可，仍是专制。以杨以德为警道，此人由车守出身，一味与民军寻仇，炸弹数轰，乃拥兵自卫，项城亦听其所为，深为不解。近日快意之事，惟彭烈士席儒（家珍）轰死良弼一节，最有关系。良弼以计死吴绶卿，天下指目，而绶卿并无恤典，众疑项城所为，实则良弼为之。不图博浪一轰，铸铁胆落，刻同善耆、溥伟同逃沈阳。闻与赵次山将有诡谋，实则马贼不过六千，未必即能有为。闻新政府将立于南京，刻尚未有动静，大抵数日内，定有明文。弟四海为家，久不作首丘之想，且自问无能，并无所补于新政，亦不敢有求于吾乡诸君子。纵使省界深严，不能容我，然卖文卖画，亦足自给。他乡之人，或不至以一老画师占彼利益，遽下逐客之令也。刻在西开卖画，所得可百余金，亦大奇事。新正当易洋装，于衣服较便，日来得诗七十余首，

姑录数首呈政，勿晒！勿晒！”

三、“（上略）严几道（按：即严复）为大学堂总监督，再三留弟不放，且五城亦将续办，如此每星期须一进京，约留三日出京。大小儿在大城官声尚好，乃作诗赐之，勸彼将来。后来新政府能听其留任，此亦甚好处。即不然，弟令其在京开小饭馆，自糊其口，亦无不可。共和世界，无贵无贱，即着接鼻裤，宁便下流耶？”

琴南在旅津的短短时间里，还留诗70余首，现录有关时事的3首，亦可见其思想状态的一斑：

过那桐故宅（按：那桐系清户部侍郎）

乱前经此见园林，道路争知相国心。名位出人先媚外，苍黄定计首埋金。压班冠履容何肃，责效身家口已昏。纵入新朝宁俊物，况无学问作华歆。

读廿五日逊位诏书

数行诏墨息南兵，毕竟收场胜晚明。终赖东朝持大体，弗争闰位恋虚名。伏戎颇已清三辅，定鼎还劳酌二京。最是故宫重过处，斜阳衰柳不胜情。

见津门大街各报馆高张大革命白帜，书

革命成功万岁，见者皆欢呼，归途感赋。

此局明明肇孝欽，卅年府怨士民深。纷奢有过秦人暴，屠胁无难汉族沉。纵未改元署光宅，居然漏网免河阴。今朝父老欢呼竟，鼎革仍原上帝心。

他在后来的另一首感时诗中表现了一种绝望的心理：

此心望治几成灰，时变纷乘胆欲摧。横议直非常理喻，边氛谁悟切身灾。国先难问遽言党，意果能公转胜才。锢疾日深医又误，唐衢泪眼向谁开？

琴南是光绪壬午（1882年）举人，是科主考为宗室宝廷。宝廷与陈宝琛同属清流派，交情甚笃。林与宝廷有知己之感，不只是座主与门生的泛泛关系。并且林的先生、致用书院山长谢章铤。与陈宝琛又是同治乙丑的同科举人，因此林对陈宝琛素以丈人称之，执礼甚恭。每遇陈宝琛夫妇生日及春节之辰，林都行拜跪礼。辛亥革命后，林通过陈宝琛的关系，将他所著的《左传撝华》献给已经退位的溥仪。陈宝琛又在溥仪面前为林延誉，说他不特长于文学，又善画画。林乃画两把箴子进献溥仪，溥仪赐他“烟云供养”四个字（据陈宝琛说这四个字是溥仪亲书的，但溥仪此时只十一二岁，很少人相信能写这擘窠大字），并出内府所藏的名家字画法帖，恣林观览。林由是感激涕零，以为三公不是过，遂与梁鼎芬辈沆瀣一气。在他70岁时已九谒光绪陵墓，表其忠贞，并说：“一日不死，一日不忘大清。死必表于道曰：清处士林纾墓。示臣之死生，与吾清相始终也。”至此已尽弃前言，俨然十足的清朝遗老了。甚至连老牌的遗老如刘廷琛、郑孝胥辈都深愧不如，讥他逾礼越分，非偶然矣。林纾与段祺瑞的交情原来很好（其侄林绣任陆军部少将科长），民国初年，段祺瑞曾拜访林于北京寓庐，林即席赠诗，有句云：“到门鉴我心如水，谋国怜君鬓渐霜”。迨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，林则痛骂段祺瑞罪浮于袁贼，直首乱之人。

到了晚年，他的思想日趋保守，是个守旧派的代表人物，在新文化运动掀起时，置身于反对者的行列之中。观其70自寿的诗，真是遗老情调可掬。且择录两首于下：

崇陵九度哭先皇，雪虐风饕梁格庄。百口人争讥越分，一心我但解尊王。世无信史谁公论？死作孤臣亦国殇。留得光宣真士气，任他地老与天荒。

烟云供养御书鲜（少帝御书春条赐臣纾凡三次，烟云供养四字为己未十二月所颁），一道纶音降九天。橘项幸从遗老后，剡心欲献圣人前。惜逢颓运如今日，恨不沙场死壮年。得傍皇居臣愿遂，移家争忍出幽燕。

林琴南平日风趣洒脱，快言快语，不存芥蒂。他曾以诗触忤过林鸿年（字勿村，道光丙申状元）。林鸿年从云南巡抚罢官回籍后，任福州正谊书院第一任山长。该书院为左宗棠督闽时所创办，举人方得入学，体制较其他书院为崇。鸿年恃状元出身，目空一切，考生的试卷稍不称其意，动辄加以墨勒，即录取前列的卷，也不过略施疏点而已。琴南思有以难之。一日问以康熙字典中画有无数圈子，是何意义？鸿年仓卒之间瞠目不能答，因此两林积不相能。有一次月课试帖诗，以“抚孤松而盘桓”命题，琴南所作全首80字的诗，都是借咏松而讽刺鸿年的，记其起首两联是：崛健何曾健，今看五大夫。支离如叟甚，节操笑君无。盖鸿年于太平天国之役以畏葸不前而遭革职也。琴南晚年颇以此举为悔。

琴南撰其母氏事略，初稿有“瘦肉”的字眼。谢叔元（字希安，福州人，癸巳举人）见而晒曰：孰谓琴南通，世有通人而不读水浒乎？不久为琴南所闻，即将“瘦”字改为“精”字，盖“精肉”出自水浒也，并致书谢叔元道谢。

光绪丁酉（1897年）科福建乡试题目为：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，子曰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有个叫林煦的以抄袭琴南在正谊书院所作的课艺而获中。有一天琴南见及林煦，林煦忸怩不安。但琴南没有表现丝毫德色，反谦逊说：我的旧作肤浅平庸，卑不足道，不图足下赏识至此，拙作赖汝大名而传，岂不荣幸。

琴南与陈衍同登壬午科乡榜，在国内都负有文章盛名。但两人意见不合，常互相抨击。我曾于何振岱（梅叟）处，见琴南致何的一封13纸长函，对陈衍忽称叔伊，忽称石遗老人，忽称诗伯。对陈衍平日言不顾行，多有微辞。但在琴南所印行的诗文中，不特没有不满的词句，并且还说：余不能为诗，而能诗之友，有郑苏戡（孝胥）、陈伯潜（宝琛）、陈石遗（衍）三人。把陈衍跻于陈宝琛、郑孝胥之列，可谓抬高身价了。陈衍则不然，于其主撰的《福建通志》中为林作传，讥林的画室为造币厂，谓动即得钱也。

琴南在世时，章炳麟痛诋他的文章，有“下流所仰，乃在严复、林纾之徒，……纾视复又弥下，辞无涓选精采，杂污而更浸润唐小说之风”等语。迨林逝世，章炳麟为其年谱题辞则曰：“乌乎畏庐，今之蒲留仙（即蒲松龄）也，余博通不如晓岚（即纪昀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作者），固不敢为论定，观其谱庶几知其人。”林毕生苦志以继承桐城派正统自期。章比拟他为蒲留仙，恐非林所首肯的。章炳麟谁一继承弟子黄侃，在北京大学任教时，同情琴南对旧文学的见解，与蔡元培意见不合而辞职，并向林执弟子礼甚恭。章炳麟对林琴南看法有了改变，说者谓受有黄侃的影响云。

林琴南卒于1924年，终年72岁。墓在福州北关外下凤池（又名白鸽笼），墓亭楹联：“著述倘沾东越传，功名早淡北山文”。系林生前所预撰的。

我的诗和字

柳亚子

关于我学诗的历史，应该先从念诗讲起。好像很小的年纪，最先的一步是念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是在我的母亲费太君膝前或是怀抱中间口授的。在满清乾嘉年间，江南一带，不是有一个大名士叫袁子才吗？这位先生虽然有人攻讦他，说他奔走于公卿权贵之门，人品不高，所以诗品也不高。不过，他倒是有特别的见解的。他不喜欢女子的缠脚，又囿于时代，不敢自己公开来反对，于是在《随园诗话》中间，借了一个大脚才女的口吻，假造出一首诗来：“三寸金莲自古无，观音大士亦双趺；不知缠足从何起，起自人间贱丈夫。”这和后来龚定庵的“姬妾古妆不如市，赵女轻盈蹑利屣；侯王宗庙求元妃，徽音岂在纤厥趾”不是一鼻孔出气吗？他反对女子无才是德的传统谬论，而提倡妇女文学，这是难能而可贵的。所以，他的女弟子很多，《湖楼请业图》就成为他的佳话了。这时候，我们吴江黎里有一对文学夫妻，是徐山民、吴子佩，都和他有往来，而子佩便是他的女弟子。子佩的女儿徐九如，少寡家贫，开门授徒，我母亲在10岁以内，曾从她受业过。所以讲起来，我母亲还是袁子才的三传弟子呢。10岁以后，家中又囿于无才是德的传统见解，不许她读书了。但她对于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却都已念得滚瓜烂熟。这样，便教给了我学诗的第一步门径。

后来，我是正式延师授课了，恰恰碰到了一位陆沅青陆老师，他特别喜欢杜甫的诗，四书五经以外，却教我念起杜诗来，而且要背诵。在当时，当然是很伤脑筋的。但久而久之，对杜诗的趣味渐渐感觉到了。陆老师去后，来了俞文伯俞老师，他虽然有些神经病，给我的影响很坏，但他倒是一个诗人（陆老师只喜欢念杜诗，却没有看见他做过），积稿盈尺，有时候也教我做起旧诗来。虽然他的教授法不高明，不过，我终于向诗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了。

自从12岁移家黎里镇以后（从前是在大胜），父亲自己教了我几年，杜诗已由背诵而改为读一下，终于把这部头的东西读完了。好像是14岁光景吧，父亲把我送进凌甘伯凌老师的门馆里去，却只每天去两个钟头，多下来的时候，还是在家里读书。在移家以前，好像我已在平平仄仄地写起旧诗来了，自然是不大像样。到了14岁，做得似乎好一些，在上海的小报上，也居然发表起来。这时候，做的都是艳体诗，说甚么义山锦瑟，韩偓香奁。到17岁那年，受了梁任公《新民丛报》诗界革命的洗礼，便把这些东西都付之一炬了。

17岁，进上海爱国学社，想从事革命不成，回来还是做诗。在同里自治学社搅了两年，20岁又进上海健行公学当教员，但革命的目的还是达不到。这时候的革命工作，一部分是武的，暗杀暴动是家常便饭；另外一部分是文的，便是所谓宣传工作了。文学是宣传的利器，诗文并重，效力很大。这样，我的诗不是文学的革命，而是革命的文学了。从健行公学回来很念了一些旧书，史部以外，最喜欢的还是诗，唐朝是李太白、李义山、杜牧之，金元之间是元遗山，明朝是陈卧子、夏存古、顾亭林、黄黎洲、钱牧斋、吴梅村，清朝是王渔洋、朱竹垞、沈归愚、袁子才、黄仲则、舒铁云、王仲瞿、陈文伯、龚定庵，都看了一些，尤其喜欢夏存

古、顾亭林和龚定庵的诗。这样，人家便以为我是龚派了。最古怪的，是对于六朝最著名的《昭明文选》以及宋朝有名的王荆公、苏东坡、黄山谷之类的诗集，却从未看过，至多，不过读读陆放翁、谢皋羽、郑所南诸家的著作罢了。因为这些人都是爱国诗人，使我油然而敬爱之心，因其人而重其诗。至于讲到诗的派别来，我是主张尊唐抑宋的，同时却也崇拜那非唐非宋的龚定庵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诗恐怕已经有了定型了吧。

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，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。梁任公、谭复生、黄公度、丘沧海、蒋观云、夏穗卿、林述庵、林秋叶、吴绶卿、赵伯先的新派诗，终于打不倒郑孝胥、陈三立的旧派诗，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。但我是最反对同光体的，于是和姚鹓雏、朱鸳雏、闻野鹤几个人就在南社内操起同室之戈来，南社也就从此瓦解了。这个时候，为我张目的，有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，还有自称太原公子揭裘而来的王玄穆，玄穆早逝，又陵先生好像也已很久没有著作发表，于是在南社中间，我和林庚白两人又渐渐成了两大的形势了。

我的诗和庚白的诗，来源是不同的。庚白由唐入宋，再由宋入唐。他在同光体中间打过滚的，却能够跳出同光体的圈子，发挥其时与世的理论，更以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入诗。他自命为古今第一，在杜甫之上，我不敢贸然附和，但也并不反对他。我自己呢，庚白死后，从淞妹那里读到了他的全集，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。到现在，我很想做一个白楼诗派的继承人。至于所谓正统派的诗人，老实说，都不在我的心上呢。国民党的诗人，于右任最高明，但篇章太少，是名家而不是大家；中共方面，毛润之一枝笔，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，可惜他勤劳国事，恐少有著作了吧。这样，收束的时代，清算旧体诗，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！

我是喜欢做旧体诗，不太会做新体诗的。但我的估计，却以为旧体诗的命运，不出50年了。不过，我对于新体诗，实在太陌生，太浅薄，所以，虽然做了三次，终不能走上新体诗的道路。至于旧体诗，我认为我的政治宣传品，也是我的武器。大刀标枪，果然不及坦克车、飞机的利害，但对于不会使用坦克车、飞机的人，似乎用大刀标枪来奋斗，也不能认为错误吧。我的蔑视旧体诗而仍然要做旧体诗者，其原因就在于此了。

讲到我的字，那真是糟糕，从小就恶书劣字出名的。除了描红和印格以外，我连法帖都没有临过。老实说，临起来也不会像样的，你的字是你的，我的字是我的，临他有什么用处呢。清党亡命以前，我是连亲戚朋友庆喜吊丧的对联，都是自己起草而请人来代写的。但，自从日本回来，一到南京，胆子渐渐大起来，而且居然也有人来请教。在桂林最后半年中，居然卖字，也居然卖到一点钱，这真是天晓得。并且，我的脾气太急，写字像冲锋一般，喜欢赤膊上阵，杀了一下，胜败不问，也就完蛋，管它写得像样不像样呢。有人说我的字是新柳字，又说有些像龚定庵，照我自己看来，只是扶乩和画符罢了。

我的诗，当然不敢妄自菲薄，并且自以为是“推倒一世豪杰，开拓万古心胸”，陈龙川的两句话，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。至于字呢，也许自有“嗜好与俗殊咸酸”之士，会来尽情欣赏的吧。

1945年10月16日于重庆沙坪坝津南村

柳亚子在桂林

李白凤

一、两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位顽强老诗人

柳亚子先生在写了“公情私谊两愁绝，剩将热泪哭萧红”的诗以后不久，因为香港风云险恶，不能再住下去，便带着夫人郑佩宜到内地来。有人要他到重庆去，他表示拒绝。而当时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先生托人致意，希望亚子先生到桂林去。当时桂林已经成为西南的“文化城”，托任潮（李济深的字）先生的荫庇，还有一些“自由”空气。同时，亚子先生的女公子无垢和我同在桂林一个学校里教书，有这几种原因，亚子先生就毅然携眷到此“山水甲天下”的桂林来了。

到了桂林，本打算搬到我们所在的学校去住，然而校长雷震虽然是黄旭初的人，却和二陈方面来往较密，亚子先生自然不愿意住到学校。于是，临时在漓江门外租了半幢房子，这半幢房子只有两间，而且四面都用木柱子撑着，一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，真有些摇摇欲坠之势，因此，亚子先生时常嘲笑它是“一木难支大厦”。

这是一座中国旧式瓦房，院墙早已倒塌，残砖败瓦满地都是，地点也相当偏僻，用不着跑警报——躲飞机。里屋是亚子先生和夫人的寝室，家具相当简陋；外间也很阴暗，具备着中国旧式房子堂屋的一切特点。纸窗是用一根竹竿撑起来的，靠着窗，放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，两把椅子。这就是一代诗人、国民党元老之一的亚子先生的书室、会客厅兼饭厅。

刚从香港回到内地，虽然住处简陋，然而总算到了战时的后方，而且总不断有文艺界的朋友来看他——邵荃麟和他的妻子葛琴就住在附近，田汉虽然住在漓江对岸的七星岩下，却三天两头从花桥跑来，因此，亚子先生的精神却比在香港好得多，长久因脑病而不再来的诗兴，也像春潮似地来了。

就在这间小屋内，亚子先生几乎每天都吟咏不辍，而且，他和朋友们琅琅然谈天下大事的笑声，也很使四邻惊异，生活虽然苦一些，倒是和蛰居香港时迥乎不同了。

二、默祭四·一二烈士

有一天，熊佛西先生写信通知我，叫我4月12日那天下午到他家去吃晚饭，据说是给田汉先生做寿。熊佛西也是刚到桂林不久，和叶子（仲寅）一起生活后，就住在离环湖路不远的一座小院子里，院子极为幽僻雅静，似乎就像古代隐士的幽居，因为院里种满了石榴树，所以佛西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“榴园”，自然佛西便自号曰榴园主人。可是这榴园里住的却不仅是熊佛西一家，他们贤伉俪住在北屋三间，东屋两间住的是画家尹瘦石，西屋两间住的是王

小涵。小涵是搞戏剧工作的，当时在欧阳予倩先生所主持的广西艺术馆里工作，因为和叶子同事，再加上佛西是戏剧界的前辈，所以小涵一找到房子，听说佛西夫妇尚无处以安“香巢”，便把上房让给他们，自己去住西屋。这几位先生住在一起，每日谈天说地，倒也使得冷静的榴园颇为热闹；自然，这种“书生横议”有时就不免有干时忌，因之，亚子先生要选这样一处颇为僻静而又“百无禁忌”的“寇区”，作为用来纪念四·一二的地点了。

我参加聚会向例是早到的，然而这天田汉先生已经先我一步“光降”了榴园。他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，热情而豪爽，谈话每多风趣。不久，端木蕻良陪着亚子先生来了。我当初真以为是替田老大做寿，所以特地刻了一块“寿昌元年”的砖头带来作为贺礼，亚子先生一看，便捋着胡须说：“寿昌是哪一朝的年号？我怎么一时想不起？”等我说出就是田汉先生的“年号”之后（田先生原名寿昌），亚子先生笑得笑不可仰了。

饭就摆在榴园庭中，那时虽然还不到榴花似火的五月，可是十多株石榴也开得相当热闹，夕阳业已西沉，四邻早已炊烟袅袅，黄昏就要降临人间了。入座以后，亚子先生首先站起来，他的面色十分凝静，高举着酒杯，用一种非常持重而异乎寻常的声音说道：“今天，我们在这里喝酒，并不是替什么人做寿，也不是到榴园来吟风弄月，而是为了哀悼四·一二烈士，也就是向蒋介石发出沉默的抗议。”他的两眼炯炯发光，面色微赤，一种凛然的气概充于眉宇。大家经这一说，马上忽地一声都站了起来，举起了酒杯，心里就像压了一大块铅似地沉重。

亚子先生已经说得老泪纵横，局面自然不免有些凝滞，于是，田汉先生提倡联句。

首先由亚子先生起句，端木接承，我坐在端木蕻良的下手，小涵、瘦石末座，第一轮还没有完，亚子先生已经有些着急，索性由他一气呵成，替我们又完了两轮。这种捷才，就连平时惯于对客挥毫的田汉先生也不能不瞠乎其后者了。

三、相思江畔的春游

大约是暮春三月杜鹃花盛开的季节，田汉先生要我和陈迹东去接亚子先生，说是敲了盐务局局长的竹杠，到相思江畔去作“春游”。

在那样一个连“诗人节”也不能够公开举行的暗无天日的时代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这一类的集会要把亚子先生捧出来做“招牌”了，因为不用这种障眼法，会议是根本开不成的。

那天去的人很多，大约总有30多人，我只记得除了亚子、田汉、佛西、叶子、朱荫龙、端木蕻良、安娥、孟超、迹冬和我之外，还有艺术馆的几位同志。

我们去时一共有三辆汽车，亚子先生和田汉、佛西坐小汽车先行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同坐的一辆卡车居中，最后一辆卡车载着酒菜和应用的餐具，就是这样一个阵容，一直开向郊外，当时的广西大学所在地的相思江。

相思江确实是一个好去处，那里小溪潺湲，绿荫如画，在山穷水复之际，有一片绝大的荷池，大约有一亩多的面积，池中有一架九曲木桥，桥正中央有一个亭子，这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。虽然池塘已是残荷败柳，衰敝不堪，再加上板桥和小亭的红漆早已剥落，然而却也有—种难得的幽趣，这真不愧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风物。据说背面就是当年永历二次入桂的行宫，有名的相思洞就在这土山下面。

到了目的地，广西大学派来一位白发萧萧的庄老生在大门口恭迎。这位庄老先生是西

大中文系的教授，据说还兼任着什么“长”的职务；然而我只顾和几位年轻朋友去看风景，竟连这位权宜的主人的面貌也没有看清楚。

开始时，记得是田汉先生致辞，因为这次聚会的地方不同于榴园，可以开门见山地、毫无隐讳地说话，这是在一座“学府”里，面前还有一位主人。虽然不是假日，学生还在上课，然而这一群人却轰动了整个西大，因之，围着湖边远远地站满了不少“观光”的学生。

田汉的话说得很隐讳，他大致说：某些人整天嘴里喊“抗战”，实际是不等日本人露面就逃之夭夭，同时，却诬蔑一些在枪林弹雨中浴血抗战的人是“光宣传，不抗战”；现在证明是谁在真正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野蛮侵略，是谁在表面上喊抗战而骨子里力求谋和……今天，北方某处的大捷，就是用事实来答复和唤醒人民的认识……我们今天借了这些人喝不完的酒来庆祝胜利，来庆祝北方坚持抗战，真正在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的大捷……封锁新闻也阻止不了消息的传来，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庆祝这种胜利……。亚子先生虽然很爱饮酒，但是他的酒量并不大，而且欢喜闹酒，所以郑夫人只允许他喝葡萄酒；这时，他也站了起来，一手推开了田汉，一手高举酒杯，大声地喊着说：“我是红党，你们喝白酒的是白党，你们和红党斗争，终归是要失败的。”接着，他又高喊：“毛泽东万岁”。

这样喝了一阵，忽然有人说马君武的坟墓在这里。马君武当年曾经是南社中人，亚子先生过去一向是以“老弟”视之的；但是他后来到广西，就和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旭初联系上了，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关系当上了广西大学的校长，因此，亚子先生后来很看不起他，所以不愿意到他的坟上去。然而，酒确实喝了不少，大家似乎也有些意兴阑珊，便怂恿亚子先生前往，同时顺便去看看“相思洞”。

亚子先生是研究南明史的人，他颇了然于永历荒朝的一些弊政，他说：“那有什么看场？当国土不存半壁的时候，南明荒朝的君臣还在那里闹不团结，制造内部纠纷；甚至把许多良家妇女掳进宫去蹂躏，不顺心的就被丢到相思洞——实际是水牢里弄死。”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杖在地上拄着，好像是要狠狠地鞭挞永历君臣似的——当时正是抗战最艰巨的阶段，亚子先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经不起大家劝说，他毕竟也在众人簇拥中前去了。

相思江两岸开遍了杜鹃花，群众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得当的名字叫做“映山红”，四面的群山开成了一片红霞，简直连人们的心都“映红”了。

相思洞附近种了不少相思树，这些不知是前朝哪位附庸风雅的人干的事。总之，似乎绝非南明遗物，这种树像槐树似的生满了羽状叶，据说开的花形式也和槐花差不多，树上结满了成串的、颇似槐荚的相思荚，荚里就是王维所咏“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”的相思子。我们几个年轻人也不管什么洞不洞，都纷纷地去采摘相思子；我更欢喜这种玩意儿，因而直到两个衣袋都装得满满的才肯罢手。这种相思子有两类，一类是扁型全红的，一类是黑白兼半的，我在20年中分赠给不少朋友，直到今天还留了些给我的女儿。

这天当然免不了作诗，亚子先生更是诗兴大发，可惜我当时只急于去摘相思子，没有抄一份留下来，只记得“老夫耄矣犹堪霸，儿女英雄领一军”这两句。

最后到了马君武坟前，看来，亚子先生本不想说什么，不知道是谁采了一束杜鹃花放到坟前，这样一来就触怒了亚子先生，他突然怒气冲冲地奔上前去，用手杖把杜鹃花打得零落满地；佛西和田汉怕再闹下去不好看，赶快把他劝开。

四、大国旗游行

长沙大火以后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衡阳保卫战。衡阳守城的方先觉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，可是外围的薛岳部队和他不合作。大后方群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，桂林各界在李任老主持之下，组织了“国旗大游行”。

组织的办法是先商讨游行及募捐办法，并同时决定了游行路线，然后由桂林的“五老”（李济深、柳亚子、封祝祺等五位老先生）主持劝募队。本来这事是由熊佛西总其成的，然而事到将成，竟被一个叫滕白也的雕刻家拿去办了。

“五老”参加劝募以后，一般商店和群众捐资非常踊跃，一条马路还没有走完，几丈长的“大国旗”上已经收满了成捆的钞票，20多个强壮的小伙子还抬不动。及至宣传车开到桂南路几家大银行门前，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的棘手：首先是中央银行不肯捐，广西银行等也不肯出钱。于是只得由“五老”下车亲自去交涉；广西银行因为李任老的关系，只得捏着鼻子捐了5万元，然而，中央银行的经理黄某却非常强硬，表示“没有总行的电报，一文也不捐”。李任老、柳亚老、封祝老等人再三劝喻，他们还是一口咬定不捐分文。这时亚子先生发了火，大骂他们是没有良心的东西，经理黄某是孔祥熙的人，便和亚老顶起来，因而，任潮先生也动了火，拍桌子问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“是不是老百姓的钱？”而且表示由“五老”署名给总行去电报，并要他们先捐10万元作为表率。可是那些人因为后台硬，一步也不肯放松，结果李任老真动了气，说他们破坏抗战，要抓人，他们才算勉强捐出了10万元。

当时法币虽然已经贬值，可是募得的数字是相当惊人的，据说如果真的用到抗战方面，倒很能有些用场，然而不知道滕白也怎么三搞两搞地竟没有了下文。这件事情虎头蛇尾地空闹了一阵，接着衡阳失守，方先觉来到桂林。

方先觉一到桂林，各界就组织了欢迎会，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人都到了场；徐悲鸿先生本来是不轻易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的，因为和方先觉是同乡，那天居然也穿了一件灰布袍，里面系了一条宽大的黑绿色的“艺术家的领带”出场了。席间，不知道怎么一来，方先觉要拜亚子先生做“老师”，亚老当时予以拒绝。可是这消息飞快地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去，后来弄得方先觉一到重庆，蒋介石就要把他押起来——本来方先觉是到重庆去领赏的，就因为他钦佩亚子先生，几乎得罪，可见得国民党当局对亚老是如何憎恨忌讳的了。

五、两次画展

我要说的两次画展，都是与亚子先生有关的：一次是尹瘦石的画展，一次是漫画家“牛鼻子”黄尧的画展。

尹瘦石画的多半是大幅历史画和仕女，他筹备这个画展，事先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，尤其是亚子先生，他对于瘦石的选题、布局种种方面都参加了意见，因而，这次画展的内容，大部分是有关南明抵抗清兵的历史画，其他一小部分也是提倡民族气节、颂扬正气的题材。自然，这些画幅，亚子先生多半都题了诗，而且有的甚至题两三次，郑成功围攻南京的大画就题了两次。这幅画是相当成功的，郑氏站在海舰上指挥作战，他身上除了金色铠甲之外，还

披了一件猩红色的大披风，颇有一种威风凛凛的气概；这在当时大后方抗日气氛低沉的年代里，确实可以当作强心剂来用。亚子先生的诗中有两句这样的话：“忘机鸥鸟休轻下，恐有人间石季龙。”（编者按：柳亚子《磨剑石诗词集》1005页载有“为瘦石题画”诗：“激浪奔涛趁好风，混茫灏气荡心胸。忘机鸥鸟休轻下，恐有人间石季龙”。）石季龙指的是谁？自然不是郑成功，更不是多尔衮，这种激忿的心情，是贯穿着亚子先生当时全部诗歌生活的。

另外一幅巨大的历史画是伯夷叔齐图，这幅画大约有一丈多长，一切都设计好了，只有夷、齐两人的面型，一时找不到合乎理想的“模特儿”。这样踌躇了很久，有一天，亚子先生忽然自告奋勇要作伯夷的模特儿，并且介绍瘦石采用鲁迅先生的面型做叔齐的画稿——我们都熟知鲁迅和亚子两位先生之间的关系，那首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诗，当年写成后，第一个赠予的正是亚子先生。

另外一个画展，却是以画漫画《牛鼻子》出名的黄尧展出的。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，或许记得抗日战争以前，在全国各大报章杂志上与张乐平的《三毛流浪记》、叶浅予的《王先生》一起驰名的《牛鼻子》，那就是黄尧的作品。

画展的内容完全是梅花。我当时很不赞成这个画展，理由是：第一、黄尧不是国画家，画梅花不是他本色当行的事；第二、那种环境之下开那种画展，不合乎时代需要。可是，亚子先生认为抗战时期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只要与抗战有利的事就支持；当时是人欲横流的大黑暗时代，贿赂公行，上下交征利的歪风盛行，“梅花”的冰清玉洁，正是与这种风气抗衡的一种象征。亚子题的诗自然是按照这个意思。

在预展时，亚子先生是随画随题——黄尧画一幅，他就题一幅，大约前后题的梅花诗总有百多首，如果这些诗稿还存在，那真是洋洋大观，恐怕要远超前人了。有一天，亚子先生一口气题了12幅之后，大家都劝他休息一下，偏巧这时来了一位《广西日报》的女记者紫风，她要黄尧给她画一幅红梅。旧社会的新闻记者是所谓“吃十一方”的（和尚称为吃十方，新闻记者连和尚还要吃，所以人们讽为吃十一方）。黄尧平时画的是墨梅，手头没有颜色，有人建议用印泥，但是效果不很好，于是，黄尧就打开紫风的手提包，拿出一截口红点了梅萼，居然十分鲜艳。画完了，这位女记者又缠着亚子先生题诗，亚子先生不假思索地站了起来，提笔写道：“沉醉葡萄艳玉容，长弘碧血渺难逢；毫端倘有西来意，不买胭脂买口红。”这“西来意”在今天看起来是应该加以注释的，因为当时在欧洲，美英联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呼声，已经达到“干打雷不下雨”的程度，而在中国的美国兵却横行霸道，妄作非为，到处调戏妇女，乱抛美国货，于是，胭脂、口红与尼龙丝袜飞满了天，亚子先生的愤慨是有对象的。

六、月牙山豆腐与太虚法师

久游桂林的人都知道那里有“三宝”，就是荸荠、马肉米粉和天一斋腐乳，然而我还是欢喜“三宝”之外的月牙山豆腐。

我曾经一度有缘借住在桂林功德林里读书和刻图章，略知一些和尚的生活情况。单说月牙山的豆腐便不简单，烧一锅豆腐真比大观园里的一盘菜不少逊色，只是所用打底子的一项“金钱菇”，就要几十块钱一斤，这正说明禅门之中生活的一面。

自从月牙山老住持圆寂以后，庙里的大厨师便被一个广东盐商李某请到他私人的公馆里

去，因而，知道内幕的人，大半都不到月牙山去领略豆腐的风味，反而改到李某家里去作客了。

旧社会的商人和官吏一样，有了两文钱便想附庸风雅。李某自然并不例外，他既然有了一位好厨师，怎肯不思以炫耀于众呢？当时桂林文酒之风很盛，许多酒楼在开张的时候，都要邀请文化界的人去吃一顿。这时，多半以亚子先生作为团体的中心人物，而嘉陵江川菜馆甚至还由亚子先生主持了一次诗钟和诗谜活动，很热闹了一个时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某因为和黄尧是老相识，听说黄尧的画展亚老很帮忙，于是，就通过黄尧，请亚子先生代邀几位朋友到他家里去尝一尝豆腐。

他家里的厨师既然是“名冠当时”，亚子先生就答应这次邀请，并且借着这个机会过江，畅游七星岩。那天同游的记得有田汉、熊佛西、端木蕻良等十多个人。天一亮，我就赶到亚子先生家去，不多一会儿，端木蕻良也来了，我们就陪着亚子先生过江，到花桥去找田老大。

沿着澄碧清澈的滴水，我们先去看“党人碑”，这是后人继作的“摩崖”，上面镌着北宋当时被目为“党人”的名字。自然，由于子孙的作伪，其间也夹杂了几个本非列名是碑的人的姓名，而且原碑已毁，这“摩崖”又是后刻，所以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兴趣，只是边游览边听亚子先生讲述北宋当时“党争”的遗祸。

看过“党人碑”，顺便就到了月牙山。循着曲折的山路，一面眺望江山秀色，一面谈着月牙山的掌故，不多时就进了山门。这时，正是当时的大和尚太虚法师在桂林宣讲佛法，因而月牙山香火之盛，可谓空前。太虚跟当局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，所以拜入座下皈依的达官贵人，真如过江之鲫，据说谒见的费用颇为可观。

我们在庙里浏览了一下，觉得挤在这十丈红尘的人堆里颇为气闷，都想早些离开，亚子先生一向是讨厌这种场面的，他自然更加急于离开这里到山顶上去透一口气；太虚听说亚老来游山，便派人来请亚老去“随喜”。亚老心里不高兴，嘴里连连地说：“我去做什么？”就丢下众人大步地冲向山门。说来也巧得很，这时李任潮先生也来游山，碰见亚子先生正出山门，就迎住他谈了几句话，并且约他到寺里去坐一坐，亚子先生只匆匆地和他告别，就带着一群男男女女直向山下走去。

遇到这种扫兴的事，大家自然都不再想游山，于是黄尧提议到李某家去，虽然离约定的时间是还早一些，但大家都觉得与其在山里乱闯，倒不如早些去打扰那位主人。

这座公馆是建筑在半山里的，三间客堂面临滴水，下面就是数十丈悬崖。屋子里布置得很清雅，陈设也颇简单，竹桌竹椅另是一种风味。我们到时主人还没有回来，大约是要去买东西了。黄尧是常客，开门的司厨者正是那位有名的厨师，经黄尧介绍后，大家就到客厅里坐下来闲谈。

亚子先生一反故常地沉默不语，即使有人和他谈话，他回答得也很简单，总之，我们都看出他今天的游兴并不好，情绪也很坏，话多了他会发脾气，所以也就三三两两地去聊天。三点半钟打过以后，主人回家了，这位商人身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袍，头上戴着礼帽，面孔上一片红光，两颊剃得发青，一眼看去就是一种营养很好的象征，动作微有一些粗鲁，一口广东官话；我猜想他是个国民党广东派的军人，大约是“弃官从商”的。

主人来了之后，自然先是喝酒；酒的样数不少，什么贵州茅台、四川大曲之类摆满了一张桌子，佐酒的都是十分地道的广东腊味，亚子先生仍然喝他的红葡萄酒。

正在喝酒的时候，梁漱溟先生来了，他不是闻风而来的，据说找黄尧有点什么事。大家看见他来，就邀请他入座，他十分客气地拒绝了邀请；这时，田汉先生就说：“梁先生‘在教’，不吃我们的东西。”于是主人就请吃“豆腐”，梁先生也就不再推辞，坐了下来。

梁漱溟先生正像他写的字一样，清瘦之中有一种瘦硬之气，鼻子上架了一副金丝边的小眼镜，这眼镜的样式似乎已经过时，大约还是民国初年的款式；一口北京话说得很流利，穿着一件二毛皮袄，挽起袖子便露出一段白色的羊皮来。

漱溟先生很健谈，他一来，就使得座上的空气立刻转变，也许又是葡萄酒的力量吧！亚子先生的诗兴也勃然而兴，屋子里又换了一种局面。

这时，有人就谈到了亚子先生，说他并不是讨厌和尚，而是不喜欢太虚和尚。对于和尚他是也有好感的，譬如当年他和旻殊的交情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；又如最近他和巨赞法师也有来往，可惜巨赞这时已经离开月牙山到桂平西山当住持去了，否则，今天的局面一定更会不同。

这里的“豆腐”果然名不虚传，我们都是吃过月牙山豆腐的，两者相较，轩輊已分；主人在大家交相称赞之余，又把他那位名厨师请了出来，替大家做了第二次的介绍。

七、撤退

亚子先生在桂林住了将近三年，值得记下来的事情当然很多，例如：为了避免反动派的干扰，坐了船到漓水上去庆祝“诗人节”，给沈钧儒先生做寿，欢迎何香凝先生，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等都是。

我们知道亚子先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诗人，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健将，他了解政治，了解社会发展；他知道旧诗没有前途，劝人不要再学写旧诗，说“旧诗应该被新诗代替”。他在诗歌座谈会上大声疾呼赞扬田间，自称是“中国最后一个旧诗人”，他劝年轻人不要学写旧诗，说自己写旧诗好像是“吃鸦片烟上了瘾的人，虽然明知鸦片烟有毒，却因习染过深戒不掉”。他又说“写新诗好比使用新武器，写旧诗好像用红缨枪”。因此，时常劝导年轻人丢掉旧诗去写新诗，就像丢掉红缨枪改用新武器一样。这些事都不详细说了，现再让我在这里说一说所谓“撤退”声中亚子先生离开桂林的情况，作为本文的结束罢！

亚子先生是自始至终不愿意到重庆去的，他讨厌那些背叛孙中山先生的“叛徒”（他在何香凝先生到桂林时，曾命我给她刻了一块图章，文曰“中山门下两完人”，就可以说明一切）。然而，祖国西南的一片大好河山眼看就要沦陷，亚子先生毅然带着郑佩宜夫人来到了平乐县山区的小镇八步。他到八步，据说想和欧阳予倩、胡仲持等留下来打游击。我当时也是无路可走的，就应了一个名叫李惟一的邀请，到那里的平乐师范学校去教书，为了暂时避难，也就到了八步。

那时亚子先生的处境更加困难，就住在我对面的一间房子里。一家人挤住在一处，亚子先生很想这样“暂安下来”，然而当时龙虎关的日军跃跃欲动，大家认为他留在那里很危险，主张立刻送他到重庆去；于是，由胡仲持先生交涉，终于得到亚子先生的同意，把他们一家人送走了。他走得很匆忙，带的行李很简单，把一切应用物品和他的《骊鸾集》和《左袒集》全部诗稿给我留了下来。